

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

易招弟为了进县剧团,她舅给改了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

很多年后,忆秦娥还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让她麻利回来,说她舅回来了。

她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她娘老骂她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了问题。她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娘老叨叨。

她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她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跷,还给腿面上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得溜直。几个敲锣、打铙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力,下巴的上下含糊,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循着热闹,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招弟是后来才知道,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得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乎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连串脆响。以至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她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瞪”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30岁的人了,还要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弟去了县剧团,才知道她舅有多糟糕,把人丢得,让她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

她从坡上回来,她舅已经在吃她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她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

舅对娘说:“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去县。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使唤哩,才11岁个娃娃么。这哪像个女儿家,简直就是个小花子,头蓬乱得跟鬼一样。”

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唠叨她舅大半天。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梳头。她舅还补了一句说:“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虮子篦尽,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娘说:“知道知道。”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痛得她眼泪都快出来了。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篦,她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她后脑勺美磕了几下说:“还磨蹭。你舅要你把天大的好事都寻下了,县剧团演员,让你去哩。头上这白花花的虮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做梦吧。”说着,又磕了她一下。

招弟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她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她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她想,那咋都是她姐来弟的事。来弟比她漂亮,能干。她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儿。娘老说,招弟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要让她去了。

洗完头,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她问:

“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

娘说:“你姐毕竟大些,屋里好多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她问。

娘说:“你舅在县剧团里,能得一根指头都能剥葱。谁敢不要?”

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



《主角》(节选)

□陈彦

两个花卡子和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戴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了两朵菊花瓣。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还给鞋里塞了苞谷叶子,但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她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

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忆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

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忆秦娥,跟着她舅——一个著名的秦腔鼓师,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

那天,离她11岁生日,还差19天。

忆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上路的……

二

易青娥跟着舅,在公社客房歇了一晚上。

公社好几个人跟她舅都熟,晚上来房里谝,还弄了半坛子甘蔗酒,就一碗腌萝卜,七七八八地干喝了半夜。易青娥睡在里间房,盖着被子,装睡着了,就听他们谝了些特别没名堂的话。有的易青娥能听懂,有的一点都听不懂。他们问她舅:剧团人,是不是都花得很?几年后,易青娥才知道“花”是啥意思。她舅说,都是胡说哩。有人说:“哎,都说剧团里的男女,干那事,可随便了。”舅说:“照你们这样说,好像剧团的东西,都长在手心了,手一挨,麻达就来了。那是单位,跟你们这公社一样,要求严着哩。你胡朝女的身上挨,一胡挨,搞不好就开除走了。你们这公社好几任书记,不都招这祸了?”后来,喝着喝着,就开始审问她舅:“听说你胡三元,就是个花和尚啊!”都问他在剧团到底有几个相好的。舅死不承认,几个人就要扒舅的裤子。舅说:“有娃在呢,有娃在呢。”有人就把中间的格子门拉上了。她听见,几个人好像到底还是把舅的裤子扒了。舅好像也给人家承认,是有一个的。再后来的事,她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她跟舅就坐班车去了县城。车在路上还坏了几起,到县城已是杀黑时分。易青娥东张西望着,就被她舅领进了一个窄得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好久,终于有一个门洞,大得有两人高,五六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歪歪斜斜地敞开着。

舅说:“到了。”

里面有好几个院子,院子中间有根木杆,上面挑着一个灯泡。灯泡上粘满了细小的蚊虫。还有一蓬一蓬的虫子,在跃跃欲试着,一次次朝灯泡上飞撞。

有人跟舅搭腔说:“三元回来了。”

舅只哼了一声,就领着她进了前边院子。

所谓前后院子,其实就是一排平房隔开的。

整个院子很大很大,是由几长溜房子合围起来的。

易青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院子。

前院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杆子上吊个灯泡。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样的罩子扣着。无数的蚊虫也在拼命朝光亮处飞扑着。有的粘到灯泡上,有的就跌落在地下了。

地上是厚厚一层飞虫尸体。

前前后后的灯杆下,都有一个水池子,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

她舅刚走进前院,就有人招呼:“三元,你跑呢,今天咱们在院子里逮了一条菜花蛇,刚吃完,你就回来了。”

“吃死你。”她舅说着,就领她走进一个拐角房里去了。

舅的房不大,摆了一张床,还有一个条桌,一把老木椅,一个洗脸盆架子。房的正中间支着他的鼓。一个灯泡,把用报纸糊的墙和顶棚,照得昏昏黄黄的。

舅的床干干净净的,被子和枕头,都用白布苦着。易青娥累得刚想把屁股端上床,就被舅一下拉了下来,说:“屁股那么脏,也不打一下灰,就朝床上赖。”说着,舅把枕头旁边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来,在她身上、屁股上,细细扫了一遍。舅说:“剧团可都是讲究人,千万别把放羊娃那一套给人家带来了。脏得跟猪一样,咋跟人在一起排戏、唱戏呢?”

易青娥刚在床拐角坐下,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易青娥一下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她吓得急忙从床边溜了下来。

那女的倒是和善,先开口了:“这就是你姐的娃?”

舅噢了一声。

被定义的和被误解的常识

——《细读文艺复兴》序

□杨 好

世纪与“文艺复兴”从来不曾脱胎换骨地断裂,中世纪也从来不“黑暗”,只是14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宗教、贸易纷争之后,城邦兴起,“城市”的概念逐渐加深。宗教的上帝视角转为对新一轮修辞系统的需要,“神学”思维被城市“诗人”思维所取代,而15世纪初发生在意大利的新一轮经济繁荣所体现出的理性商品思维与“市民美德”,得以使“人文主义运动”自上而下地遍及社会各个层面。

当理性主义回归精神和物质生活——在现实主义、世俗化和个体化要求不断增强的文艺复兴社会里,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科学逻辑、城邦制度,以及文学、艺术都为人文主义者们提供了直接的参照和改革的基点,也为人文主义者们提供了非宗教化的时代意识(或最初的“现代社会”意识雏形)。“文艺复兴”期间,对古典文明的亲近使人脱离“天国的幻想”;地理大发现使思辨的世界观链接社会现实;艺术使人变得有真实感受力。之前欧洲社会无语法的状态通过“文艺复兴”对古典文明的反照介人城市系统,智识创新被有意识地梳理,逐渐建立起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语法系统。

与文艺复兴一起生长起来的,是终日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所以第一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恰恰是由大商人和大政治家构成的——他们生长于社会的勾心斗角之中,在权力的堡垒里既安全又警惕地观察身边政治力量和经济势力的变化,他们在世俗社会的生长节奏中感受与传递时代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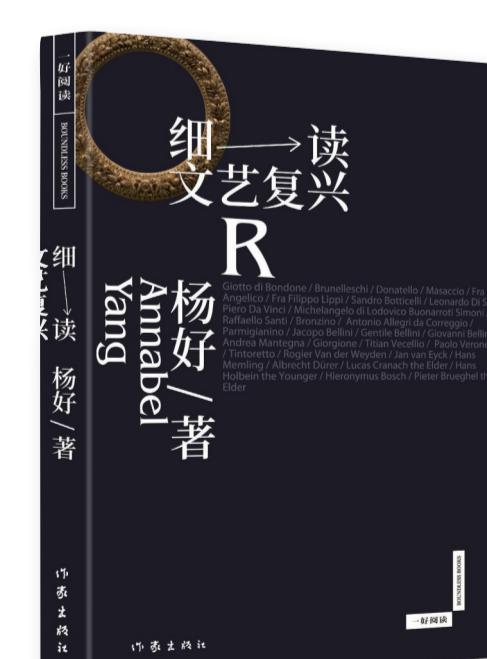
“文艺复兴”被谈论了几百年,今天我们依然不断打扰文艺复兴的亡魂与幽灵。我们将自己仍

装成旅游者、艺术爱好者、附庸风雅者、文艺卫士,或是今天时代的“局外人”。在极易制造出来的信息的覆盖下,艺术史急喘着被纳入虚拟文化系统,“文艺复兴”变得异常流行,也变得易于搭配。这个名词可以被用来谈论理想;可以指代品位不俗;可以突出自己与众不同;可以表达自己的知识身份;可以艳压一切体现优雅属性的装饰物……

“文艺复兴”就像一个有魔力的终极首饰一样,瞬间满足了我们对一切崇高的、美的、理想的参照。于是,它逐渐变得像开始流行起来的“艺术史”一样,繁荣而失去控制。一直以来,我们艺术史定义里的文艺复兴缺少标准,且并不是统一的标准,而是观看的标准。

“文艺复兴”的形象和视觉图形在信息时代一定总是比“文艺复兴”作品真迹更快和更广地被第三方传递给观者。我们在看到作品真迹之前,往往已经为自己了解了它的全部。这时,图像和图像塑造的想象会迅速扩张为个人生活方式以及装饰元素,并被我们快速消费。我们不仅消费艺术品,我们也在消费艺术史。当对艺术史的消费开始成为一种有品位的炫耀和谈资的时候,欣赏艺术标准的建立又显得必要而迷惘。虽然更多的时候,我们误将艺术常识当作艺术标准去学习,我们忘记了,艺术从来不是习得的。

在所有东方对西方的想象中,很不幸,“文艺复兴”其实是最难被模仿的一种。若不适度,就会遮掩不住新钱味道;若淡然置之,又会失去“文艺复兴”里本就带有世俗气的那些迷人;若沉迷其中,则会被臆想和追忆的空气席卷而去。艺术常识里对于西方艺术史的讲述其实是一种窥伺,



而大多东方化的西方经验所传递的是被矫饰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有自身的复杂性,也有自身的灵光。很少人在学习、解读或说喜爱“文艺复兴”的时候会陷入“文艺复兴”所制造的幻觉,幻觉往往带来满足的晕眩,这是文艺复兴的奇特魔力,也是文艺复兴的最大局限。

在我的系统定义里,“文艺复兴”是历史,是状态,是风格,是修辞,是语境,更是时代精神 (der Zeitgeist)。在理想化的设计中,我本来希望自己第一本有关文艺复兴的书并不是现在看到的讲稿,而是某种语法。现在呈现出来的是讲稿。讲稿的好处是它面对的受众一直在场,我不断试图去讲述一个个清晰的、可被理解的细节与

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不会吧,这娃咋……”

不知她想说啥,舅急忙给她挤眼睛,她就把话咽回去了。

舅说:“这就是剧团的大名演,胡彩香。叫胡老师。你看过胡老师戏的。”

易青娥怯生生地点点头。

舅对胡彩香说:“这回就靠你了噢。下个礼拜就考试,你无论如何得把娃带一带。先把唱腔音阶教一下,再给娃把胳膊腿顺一顺,能看过去就行。”

胡彩香说:“哎,这回报名的可不少,据说是五选一呢。”

舅说:“哪怕十选一呢,剧团的亲戚还能不照顾?”

胡彩香说:“你看你才回去两天,就啥都不知道了。今早才开的会,黄主任说了,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团内团外一个样。”

舅把牙一咬:“嚼他娘的牙帮骨。不收我姐的娃,你叫他试试。”

胡彩香急忙掩嘴说:“你悄声点。小心人家听见,又开你的会哩。”

“开他妈的个瘪葫芦子!”舅骂开了。

胡彩香急得直摇头:“你就是个挨了打,不记棍子的货!”

“记他妈的瘪葫芦子,记!”

“好了好了,我都不敢跟你多说话了,一搭腔,躁脾气就来了。明晚又演《向阳红》呢,你知道不?”

“给谁演?”

“说是上边来了领导,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工作的。”

“重要演出,那肯定是你上么。”

胡彩香把嘴一撇:“哼,看把你能的。我上,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还没织下背心呢。”

“啥事嘛?把人说得稀里糊涂的。”舅问。

“你不知道了吧。那骚货前一阵,在县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拆呀缠呀的,不是老在用钩针,钩一件菊花背心吗?你猜最近穿在谁身上了?”

“黄主任的老婆?”

“算你娃聪明!昨天晚上下了场雨,那女人就穿出来纳凉了。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好不容易下点雨,都不怕捂出痱子来。嘿,人家就穿出来了,你有啥办法。哼,穿么,哪一天把那个米妖精,勾引到她老汉的床上,她就不穿了。”胡彩香说得既眉飞色舞,又有些酸不溜溜的。

舅说:“都定了,让米兰上?”

“人家今天把戏都练上了。”

“让她上么。明不行,领导还要硬朝上促呢。看我明晚不把这戏,敲得烂包在舞台上才怪呢。”

胡彩香又撇撇嘴说:“吹,吹,可吹。小心明晚上给人家献媚,把糖都喂到人家嘴里了。”

“我给她献媚?呸!”

胡彩香说:“我就看你明晚能拉出一概啥硬货来。”

“放心,那些给哈领导献媚的,我都有办法收拾。”舅把话题一转,说:“你可得把这娃的事当事。”

胡彩香说:“放心。你这窄的床,又是个女娃,睡着多不方便,就到我那睡几天吧。刚好,我也能给娃说说戏。”

舅说:“那就太麻烦你了。”

“看你那死样子,还说这客气话。”胡彩香说着,就把懵懵懂懂的易青娥拉到她房里去了。

胡彩香的宿舍跟她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房子一样大,里面摆设也几乎差不多。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发卡、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走进去,先是一股香味扑鼻而来,甚至有些刺人眼睛。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让易青娥洗了麻利睡。她就出去到院子里,跟水池子附近坐着的人谝闲传去了。易青娥听见,那些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

易青娥洗完后,就